

追述的意义

——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叙事价值考量

张晓校

【提要】 历史学家创作历史时的亲历或个人经历向来为人们看重,但社会历史内容的复杂性,与历史学家个人经历的有限性永远是矛盾的:历史学家不可能亲身经历、亲眼目睹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,于是,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的事后追述便构成了历史叙事的主流,考量历史叙事的意义无疑应以追述为切入点。历史学家创作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追述的过程,历史学家完成的叙事著作则是这一过程的结果。研讨历史学家著作的价值意义,作为“非在场”叙事的追述不可避免。

【关键词】 历史学家 历史 追述

著作历史与历史学家亲身经历之间的关系,中外史学家中早已形成传统,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可谓中西典范。诚然,史家的亲身经历、耳闻目睹的确增加了历史著作的可信度,但需要关注的是,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纵然有丰富的经历和阅历,也无法亲身经历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。时间和空间规定了历史学家亲历的局限性,不仅无法亲自体验所处时代的一切,更无法“穿越时空隧道”,亲身体验逝去的光阴,只能根据各种各样的原始资料事后完成的追述,“……从当下回望过去的生成”,^①作为“过去与当下中介者的历史学家”,^②通过回望、追述完成历史叙事。绝大多数时候,历史学家对既定、既成的事实,即对“完成时态”的人或物,以“过去时态”发表评论,完成历史叙事。^③ 19世纪兰克所强调的“据实记事”则从另一个侧面昭示出历史学家的追述必须忠于史料,依史实叙事。于是,“历史学家,根据最严格的定义,是说出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命题为目标的一类人”。^④ 历史学家作为“书写过去各类事件的人”,^⑤完成以“过去事件”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命题,“叙事(narrating)才是基本的”。^⑥ 研究

① 奥斯瓦尔德·斯宾格勒:《西方的没落》,吴琼译,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,第154页。

② Ceri Crossley, *French historians and romanticism*, Routledge, 1993.

③ Keith Jenkins, *On What is History?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*, London and New York, 2005, p. 20.

④ 阿隆(Aron, R.):《历史讲演录》,西尔维·梅叙尔编注,张琳敏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,第116页。

⑤ *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*, edited by Aviezer Tucker.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, 2009, p. xii.

⑥ 汤因比等:《历史的话语: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》,张文杰编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276页。

历史学家的叙事应对历史学家的“非在场”叙事^①——追述进行考量。某种意义上讲,历史学家创作历史的价值意义即是追述的价值意义。

—

黑格尔在传世名著《历史哲学》序言中,将史家修史归纳为三类:原始的历史、反省的历史、哲学的历史。^② 黑格尔的论述阐释了史家修史的方法论归属,但如果说古今中外史家的历史叙事是原始、反省、哲学的历史,那么也应该注意到他们创作的历史还是追述的历史。中国史学巨擘吕思勉先生把“过去的历史”分为“神话时代”、“传奇时代”、“传说时代”。^③ 无论怎样评价这种划分,对这三个时代的历史创作一定是史家通过“非在场”叙事——“追述”完成的——历史学家不可能亲身体验“神话”和“传奇”时代,“传说”本身即已经说明了历史学家的“非在场”性。历史叙事种类的划分,从源头上说明了“追述”是历史学家完成历史叙事的共性特征。希罗多德“田野考察”式的走访、调查活动颇得后人赞誉,然而,“在希罗多德的叙事中,口述传统变成了历史……。”^④在没有印刷术,信息传播渠道十分有限的年代里,口述及其传统的重要意义毋庸讳言。希罗多德的贡献在于,他以“非在场”的身份搜集、整理了口述资料,使口述资料通过他的追述变成了传之后世的历史叙事。“对于希罗多德来说,重要的是报道已经发生了的事……。”^⑤亚里斯多德在《论诗学》中,讨论诗与历史区别时指出:“历史学家描述的是已经存在的事,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……。”^⑥历史学家与“已经发生了的事”之间的关系,“西方史学之父”的叙事实践,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论述,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历史学家非在场、追述的限定所在。

黑格尔关注到了历史学家创作历史著作的原始性,亦未忽视历史学家的经历、亲历的有限性。他指出,历史学家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一切,也要利用他人的“报告和叙述”。^⑦ 笔者以为,利用他人的“报告和叙述”是历史学家最常见的治史方法——占有和应用史料,也恰恰是利用史料完成历史叙事的追述。“一般认为,‘正宗历史学家’寻求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件,为文献中报告的事件提供准确详尽的重建。”^⑧所谓“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件”,无疑是历史学家根据各种已知史料,建构自己的历史叙事,此时“非在场”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追述历史,进而达到“重建”之目的。对于历史学家的叙

① 关于历史学叙事的定义,笔者所见的界定是:“在人们解说历史时,将历史内容作为事件按顺序排列,而历史过程通常被形容为故事讲述。”见 Alun Munslow, *Deconstructing History* (Second Edition), Routledge, 2006, p. 3. 这一界定是否科学准确有待讨论,但叙事者在叙事时不在场的身份是可以确定的。关于历史的叙事,有学者倾向于“讲故事”,但笔者则认为历史学的事件与“讲故事”并非文学意义的,主要指“过去的事情”似乎更合适。至于历史学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,克罗齐的“没有叙事,就没有历史学”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。见彭刚:《叙事的转向: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,第 3 页。

② 黑格尔:《历史哲学》,王造时译,上海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1 页。

③ 吕思勉:《史学四种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,第 63—65 页。

④ *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*, Edited by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, Blackwell Publishers, 2002, p. 43.

⑤ 罗维特:《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: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》,李秋零、田薇译,三联书店 2002 年版,第 10 页。

⑥ 亚里士多德:《诗学》,陈中梅译,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,第 256 页。

⑦ 黑格尔:《历史哲学》,王造时译,第 1 页。

⑧ 海登·怀特: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》,陈永国、张万娟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,第 64 页。

事内容而言,主要还是“其他人经历的东西”。^①柯林伍德在评价“剪刀加糨糊”的历史学治学方法时,专门提到了“书面资料”和“非书面资料”。^②对于历史学家而言,“书面资料”和“非书面资料”同等重要,无可偏废,而且本质上都属于“其他人经历的东西”。因此,“其他人经历的东西”限定了历史学家的叙事必定是“非在场”的追述,决定着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和使命:原始资料的“接受者”、“解释者”。^③

历史学家的工作——叙事——过程本身已经将其自己限定在“非在场”的追述之中。金毓黻先生有云:“修史之序,先广搜史料,然后加以别择去取,勒成定本。”^④这种修史之序,不仅是历史学家的“工作程序”,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追述之定位。西方学者认为,历史学家著作历史叙事时,“历史学家首先要获得史实真相,然后再将这些史实融入叙事中……。”^⑤金毓黻先生和西方学者关于史家“工作程序”的论述堪称异曲同工。古今中外史家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按照爬梳史料,甄别筛选,最后依据史料完成历史叙事。搜集、梳理史料过程中,无论是亲身经历、亲自参与,走访踏查,还是埋头故纸堆,皓首穷经,历史学家们都在通过搜寻各种原始资料,^⑥为完成自己的追述做必要的准备。历史叙事的追述以此为起点。卡尔生动地将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为“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”,^⑦即历史学家在既定的、现成的资料中进行选择,说明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起点是追述。历史学家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史实(包括亲身经历和资料等)与历史学创作(叙事)往往属于两个话语系统。这两个话语系统分属当下与过去——他者的话语,当下的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和事后追述是对他者话语的“诠释”。^⑧历史学家对两种话语系统的对接过程证实了:历史“是对过去的一种有秩序的表述”。^⑨兰克的那句名言:历史的主旨在于“陈述过去发生的事”,^⑩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历史学家须臾脱离不了“过去”——他者的话语系统。历史学家通过对他者话语系统的诠释——追述,使他者的话语与当下话语完成了链接。没有历史学家能够逾越这种框定,离开了他者的话语系统,历史学家的叙事将是无源之水,无本之末。面对既成、既定的历史事实、他者的话语,“非在场”的历史学家只能通过追述完成历史叙事。正如阿隆所言:“……历史学家,在本质上,是一些叙事者;最为著名的例子,便是修昔底德和他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。”^⑪希罗多德可以绘声绘色地描述希波战争的进程,发表感想,警示后人,但却无法改变、改动战争的结局。年鉴学派大师马克·布洛赫关于历史学家“倒溯历史”^⑫的论述,从追述意义层面考量,似乎可以换个角度理解大师

① 保罗·立科:《历史与真理》,姜志辉译,上海世纪出版集团、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,第12页。

② 柯林伍德:《历史的观念》,何兆武、张文杰译,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,第382页。

③ M. A. 巴尔格:《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》,莫润先译,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,第94页。

④ 金毓黻:《中国史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,第2页。

⑤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, edited by Aviezer Tucker.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, 2009. p. 91.

⑥ 有西方学者将这些原始资料称之为“现存的各种结构”,包括档案、工艺品,乃至回忆录。John Lewis Gaddis, *The Landscape of History: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;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2, p. 41.

⑦ E. H. 卡尔:《历史是什么?》,陈恒译,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,第90页。

⑧ 阿隆:《历史讲演录》,西尔维·梅叙尔编注,张琳敏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,第5页。

⑨ 奥斯瓦尔德·斯宾格勒:《西方的没落》,吴琼译,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,第16页。

⑩ 黄进兴:《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》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117页。

⑪ 阿隆:《历史讲演录》,西尔维·梅叙尔编注,张琳敏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,第261页。

⑫ 马克·布洛赫: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,张和声、程郁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,第37、40页。

的论述,即历史学家在整理资料,创作历史时,面对的是既定的史实,即使“倒溯历史”,也丝毫没有降解历史的价值。反之,也正是由于历史叙事的“非在场”性,“倒溯历史”抑或“正溯历史”均成为可能,其中所体现的差异,既有历史自身的规定性,也直接表现了历史学家学养天分,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。

研习历史,人们所接触的历史著述具有滞后性——是历史学家事后完成的,亦如马克·布洛赫所指出的,对历史了解的“间接”性。^①这种“间接”一定是“事后”的间接,不可能是“即时”的“间接”。“因为历史学家对于他所描写的许多形象,几乎是难于有直接经验的。”^②所以,西方学者强调:“恰当地把握历史及其历史上的解释,必须以回溯的方式……”。^③“回溯的方式”一方面阐释了历史学家的“非在场”身份;另一方面,也解读了历史学家“间接”叙事的根源——“把历史认识的间接性视为其特有的属性似乎大致上是符合实际的”。^④历史学家创作历史的“间接”性可在不同层面印证历史学家的“非在场”定位:即使史家历史叙事的基础是亲历、亲眼所见,那么这种亲身经历也是有限的——“历史学家所知道的历史事实,只能根据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不完全的遗迹。如书籍、文件、碑文、残存的建筑物以及其他考古遗迹”。^⑤历史学家对已知、现成的各种资料的梳理,已经是使用通过间接手段获得知识。历史学家在无限的时间线条上,永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“点”;在广袤的空间范围内,历史学家的阅历、经历同样微不足道。就主观而言,历史学家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总是有限的、相对的。史家的经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过是沧海一粟,纵然历史学家有“在场”的经历,也难以对自己所处时代方方面面的信息“一网打尽”,永远存在补一漏万的遗憾。在不可胜数的历史事件、历史场景中,能够纳入历史学家叙事视野的实在微不足道。海登·怀特从历史学家阐释历史的角度指出:“(历史学家)以叙事再现历史进程的某一特定时刻,历史学家不可能把全部事实都包括进来。”^⑥中国学者梁启超则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,阐释了历史所承载内容的丰富性、复杂性:“历史范围极其广博,凡过去一切活动都是历史。古人说:‘一部十七史,何从说起?’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,何况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?”^⑦按照英国学者埃尔顿的说法:“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所说,所思、所做和所经历的一切事物”^⑧进行理解,历史学家的感知、所掌握信息、个人经历,直至最后完成叙事等距离“一切事物”的要求相去甚远。^⑨基于历史学家把握“全部”、“一切”史实的相对

① 马克·布洛赫: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,张和声、程郁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,第37、40页。

② 詹姆斯·哈威·鲁滨孙:《新史学》,齐思和等译,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,第34页。

③ 罗维特:《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: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》,李秋零、田薇译,三联书店2002年版,第5页。

④ 耶日·托波尔斯基:《历史学方法论》,张家哲等译,尤天然校,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,第316页。

⑤ 詹姆斯·哈威·鲁滨孙:《新史学》,齐思和等译,第35页。

⑥ 海登·怀特: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》,陈永国、张万娟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,第63页。

⑦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160页。依笔者理解,梁氏此处所论“十七”、“二十二”、“二十四”不仅指史籍浩瀚,还有更加浩繁的历史内容,令史家无法一览无遗。

⑧ G. R. 埃尔顿:《历史学的实践》,刘耀辉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7页。

⑨ 美国学者卡尔·贝克尔也指出,历史学家对“与过去人们的生活有关的一切事情”感兴趣。见汤因比等:《历史的话语: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》,张文杰编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288页。但兴趣与“一切事情”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超越的,历史学家的叙事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遍览“一切事情”的标准,所谓的“一切事情”充其量是相对的、理想主义的,历史学家的局限与“一切事情”叙事之间的矛盾只能依赖追述得以调节。

性、狭义性,西方学者特别强调“选择”的重要性是有道理的。^①另一方面,“在场”的历史学家尚且存在经验不足等缺憾,而对于那些“非在场”事实、人物的感知,历史学家只能依赖间接的认识获得。人类社会信息的无限性和史家认识、感知能力的有限性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,决定了历史学家必须依赖间接知识叙述历史、追述历史。因此,对于历史叙事,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时候是“非在场”情况下完成的,历史学家历史叙事的追述性也由此被限定。历史学家奉献给人类的叙事作品超越了时间和空间,但历史学家本人却无法超越时间和空间;历史学家的作品价值意义通过超越时间和空间得以彰显,实现这种彰显的主要路径一定是追述。

二

海登·怀特指出:“按目前的理解,历史是一种事件,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……。”^②在历史学研究领域,“特定历史环境”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语句,似乎任何历史上的人或事都可以“特定历史环境”修饰。但对于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叙事而言,将“特定历史环境”改为“限定的历史环境”似乎更合适。这种“限定”既是时间的限定——历史学家本人所处的时代不可超越,也是空间的限定——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也无法脱离自己所在的空间,体验无法企及的空间范围内的社会变迁。“限定的历史环境”决定了历史学家既要解决不同话语系统之间如何“链接”等问题,也要在当下与过去之间架设“桥梁”。历史学家无法摆脱“限定的历史环境”的限制,亦无法突破这一定式,但追述却能突破类似“限定”,将包括“限定的历史环境”在内的、纷繁的历史场景呈现给读者,追述的价值意义借此得以凸显。

依笔者理解,“限定的历史环境”既包括了时间的限定,也包括了空间的限定:历史学家经历的时间是有限的,经历的空间同样是有限的。“历史学家无法知晓过去发生的一切……。”^③历史学家的思想和笔端可以跨过时间和空间,恢宏的历史叙事绝非历史学家个人有限的经历所能覆盖的。人们常常议论历史是时间的学问,但更是空间的学问,即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在特定的空间内发生的。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事时,既关注时间的一维性,也留意空间的多维性。西方学者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创作与文化之间的关系:“历史学家总是在书写人类形形色色的文化(古代的希罗多德和塔西佗已经写作了这类著作)……。”^④考察、叙述文化、文化演进的历程无疑是历史学家的中心工作之一,^⑤文化所承载时间、空间内涵的复杂多样性,从不同层面昭示了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身份属性。

诚然,历史学家的功绩与贡献绝非单纯地追述了历史,强调历史学家历史叙事的追述性,丝毫没有遮蔽历史学家创作历史的价值意义。众所周知,“历史学家是在知道‘事件’的最后结果的情况

① 汤因比等:《历史的话语: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》,张文杰编,第307页。

② 海登·怀特: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》,陈永国、张万娟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,第35页。

③ Marnie Hughes-Warrington, *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*, Second Edition, Routledge, 2007, p. 89.

④ *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*, Edited by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, Blackwell Publishers, 2002, p. 10.

⑤ 当然,除了文化之外,以往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宗教习俗、各项制度、社会变迁等,也都是历史学家一直关注的对象。历史内涵的复杂性恰在于此。

下,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追溯他所未知的原因链条的”。^① 马克·布洛赫甚至宣称,没有人在乎历史学家的“马后炮”行为。^② 然而,历史学家并非单纯地罗列自己“在场”与“非在场”的史实,不仅要对各种原始资料的甄别、筛选、辨伪等,^③而且还会注入历史学家的批判精神,体现历史学家审视和批判的目光。“历史学家不同于诗人,必须确保对过去陈述的真实性。”^④追求真实、保证自己的叙事真实可靠,“非在场”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辨伪的本领。不唯如此,“论证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作出一般的叙述,而是要作出(这是我的说法)表达意义的叙述”。^⑤ 这种“表达意义的叙述”理所当然包括了批判精神的注入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宣称:“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的事实,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。”^⑥梁氏所云“存疑”,是指历史学家以审视的目光对待已知的史料,不会采取简单的“拿来主义”。历史学家依据已知结果、既定事实的种种资料,对叙述人或事发表议论,褒奖或鞭挞,已成为人们认知历史学价值——事后评判的关键所在。这些价值判断,既是“事后”完成的,也通过追述的形式得以表达。正是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叙事为“事后”完成,自然不会简单、流水账式介绍历史的发生过程,会探索“历史变更一般是如何发生的”。^⑦ 历史学家还会依据事物的变迁,“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好、阴暗和丑恶”。^⑧ 反之,如果历史学家不是“马后炮”,而是对未来进行种种预测,那么历史学家便会有抢夺未来学家、预测大师,乃至算命先生的“饭碗”之嫌。显然,这种逻辑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,反倒是种种“马后炮”更能赢得青睐。对此,马克·布洛赫议论耐人寻味:“长期以来,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,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。”^⑨人们往往对历史学家的各种价值判断评头品足,历史学家的各种结论、判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,但并非因此消解、否定追述意义。通过追述,历史学家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,使人类社会的历史薪火相传。“一位历史学家面对着的是过去的现实,但那是被细心验证的、拂去尘埃的、重构的现实。”^⑩当然,人们之所以对历史学家并非绝对完美无瑕的追述提出质疑,主要原因在于,历史学家在追述历史过程中,主观的价值判断和所掌握的历史事实的局限性:历史学家绝无可能观察、经历所有的史实,在此前提下,历史学家追述历史必然介入的个人因素,也难免存在局限。历史学家永远摆脱不了“非在场”的局限,苛求历史学家的追述、叙事没有局限是不现实的。

狄尔泰认为,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记叙是历史学家著作的主要形式。^⑪ 狄尔泰所云“过程”,绝大部分应是历史学家没有参与其中的、属于“往事”的过程。似乎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狄尔泰的论述,即历史学家追述的历史、著作历史是一个过去时态的过程,作为“非在场”的历史学家置身于

① M. A. 巴尔格:《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》,莫润先译,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,第92页。

② 马克·布洛赫: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,张和声、程郁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,第103页。

③ 西方学者强调:“历史学最艰巨的任务之一,是对史料进行辨别。”Henige, David P., *Historical Evidence and Argument*,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, 2005, p. 45. 笔者认为,辨别史料不仅是史家的基本功,还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的身份特征。

④ Marnie Hughes-Warrington, *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*, Second Edition, Routledge, 2007, p. 47.

⑤ 汤因比等:《历史的话语: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》,张文杰编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249页。

⑥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159页。

⑦ 威廉·德雷:《历史哲学》,王炜、尚建新译,三联书店1988年版,第130页。

⑧ Marnie Hughes-Warrington, *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*, Second Edition, Routledge, 2007, p. 331.

⑨ 马克·布洛赫: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,张和声、程郁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,第102页。

⑩ 布罗代尔:《论历史》,刘北成、周立红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8页。

⑪ 耶日·托波尔斯基:《历史学方法论》,张家哲等译,允天然校,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,第130页。

“过程”的时间和空间之外,属于另外一种“过程”。如同前文所谈两个话语系统一样,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事时,完成了两个“过程”的链接。只不过叙事“过程”必须要建立在往昔“过程”基础之上。

三

历史学家追述历史,不仅是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决定,亦为历史学科本身滞后性属性使然。不止一位西方学者强调:“历史应当被认定为过去发生的一切”;^①“主流历史学家确信,他们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,而不研究可能发生、或许发生,或将要发生的事情”。^②凡此种种,只说明一个问题,即历史学家所关心的是人类的过去。^③人类“过去”的一切无法再度呈现,对于过去的人或事的了解、叙事却可依赖历史学家通过追述——对过去的史实加工整理,重新编码——达到目的,也使历史学与生俱来地凸显出“关于过去的学问”的特征。“过去即是已经‘发生’的事情。但过去和历史学家笔下的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,过去如期发生,而历史则通过写作、阅读、记忆才能‘产生’。”^④历史学家的各种劳作的意义凸显为,让过去和历史“截然不同”。为此,“历史学家收集事实,熟知这些事实,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,撰写历史”。^⑤其间,历史学家熟知的事实是既定的事实——“过去”,是历史学家以追述的形式历史叙事的基础。历史学家“熟知的”历史事实不可能(全部)是先验的,也不可能是(全部)经验的,于是便从源头和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叙事的滞后性,而且这种滞后性与历史叙事客体时间长短成正比:越是距离史家修史的时间久远,滞后性特征越明显,价值意义也随之更加突出。在对久远历史的追述过程中,历史学家的经历与经验无从谈起,“后代的著述”或“远地的传闻”,^⑥已经是历史学家的第一手资料;不仅是间接的知识,甚至是“间接的间接”的知识。希罗多德、司马迁在中西史学史的地位及其治史态度颇受推崇,二人“田野调查”的求真精神颇得后人赞誉,但两人“不仅审视了他们所处的社会(古典希腊、汉代中国……),而且将更大的空间纳入自己的叙述”。^⑦两位历史学家显然无法超越所在的时间和空间,不得不通过间接知识获得,历史叙事必定依靠追述完成,滞后性毋庸置疑。正是因为这种滞后性,使历史学家有了取舍、选择、裁量、评判的机遇,为追述历史创造了客观条件。对于历史学家的事后叙事的时间性和价值意义之间的关系,吕思勉先生的论述颇说服力:“许多事情,往往要隔了一个相当的时期,然后渐明;再隔了一个较长的时期,然后大白的。”^⑧

关于史家叙事的追述性质,另一个颇能说明这种滞后性的生动事例是中国赫赫有名的“二十四

① Keith Jenkins. *On What is History?*,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, London and New York, 2005, p. 28.

② *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*, edited by Aviezer Tucker.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, 2009, p. 103.

③ 威廉·德雷:《历史哲学》,王炜、尚建新译,三联书店1988年版,第6页。

④ *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*, Edited by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, Blackwell Publishers, 2002, p. 319, 394.

⑤ E. H. 卡尔:《历史是什么?》,陈恒译,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,第90页。

⑥ 詹姆斯·哈威·鲁滨孙:《新史学》,齐思和等译,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,第128页。

⑦ *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*, Edited by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, Blackwell Publishers, 2002, p. 319, 394.

⑧ 吕思勉:《史学四种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26页。

史”。国人颇为自豪、蔚为壮观的“二十四史”出自历朝历代官方职业史家之手。然而,稍加仔细思量,不难发现,“二十四史”均为追述的历史,均为当代人为前辈人修史——追述的结果。“二十四史”一事实印证了这样一种结论:“历史必然是由当下活着的每一代人去不断地重新回忆、思考和重新研究。”^①“二十四史”的修撰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印证了克罗齐“把历史看作‘当代史’”的论断。^②中国历代史家所遵奉的“笔削”、“一家之言”等传统,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“非在场”史家治史的追述意义。诚然,古今中外史家的追述绝非“戏说”或想象,各种史料、资料是创作的重要依据。面对各类史料,历史学家往往对书面资料情有独钟。当代西方学者在研究罗马史家 Ammianus 时发现:“(历史学家)对书面资料的依赖远胜于第一手资料。”^③历史学家恪守“埋头故纸堆”的传统,首先说明了历史学叙事对资料的依赖,其次则从本源上说明了史学叙事追述的不可超越性:历史学家根据已有的文本资料创作历史。按照德国学者德罗伊森的观点,历史“在它还没有被历史学家掌握之前,已存在于史家生活的环境与条件之中”。^④这种历史“先于”历史学家存在的客观事实,似乎在时间排序上界定了历史学家的所有创作、叙事活动“非在场”的滞后性。

人们对“历史 = 历史学家 + 往事”^⑤的公式有不同解读,但该公式的有趣之处在于,当下的历史学家之于往事的“非在场”属性不能动摇,历史学家的职业特性在于“与往事”、“与过去”打交道,通过“滞后性”的工作,历史学家的贡献得以彰显。

四

西方学者认为,描述过去是历史学的特性;^⑥“历史是一门探究往事的学问”。^⑦历史学家总是通过重构完成历史叙事的,即历史学家创作历史时,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史料,包括本人亲自、亲临所搜集到的各种信息,以及占绝对多数非亲身经历的各种信息资料,经过甄别、考订后,^⑧完成追述的历史叙事。通过重构与解构,历史学家完成了历史叙事,原本杂乱无章的史料,变成了人们喜闻乐见、能够复现往昔的历史文本。重构一方面决定了追述存在的根本原因;另一方面,也决定了追述的价值意义。“解释历史”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。也就是说,历史学家不仅要努力完成历史叙事,也肩负着解释的使命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,对历史学家的解释进行剖析、评价,但“被解释”的对象却是一种“过去完成时态”,历史学家永远以“非在场”的身份解释历史,追述往事,并以此彰显历史学“过去的特性”。这种“非在场”的追述也免去了历史学家诠释历史时,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缺憾。

① 罗维特:《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: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》,李秋零、田薇译,三联书店 2002 年版,第 6 页。

② 贝奈戴托·克罗齐:《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》,道格拉斯·安斯利英译,傅任敢译,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,第 51 页。

③ David Rohrbacher, *The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*, London and New York, 2002, p. 24.

④ 德罗伊森:《历史知识理论》,胡昌智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,引论第 14 页。

⑤ 保罗·利科:《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》,王建华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,第 40 页。

⑥ Keith Jenkins, *On What is History?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*, London and New York, 2005, p. 16.

⑦ 阿普尔比等:《历史的真相》,刘北成、薛绚译,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,第 137 页。

⑧ 考据、订正是历代历史学家最常见的治史方法。考据学的发达、完善并为人们所接受恰恰证明了历史学家的“非在场”身份及其追述的意义。也就是说,正因为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,考证、考订的价值意义才得以凸显。

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一直是史学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,不带有主观性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。历史学家在叙事过程中必定带有自己主观性,至少也要表达出自己的价值判断,是非好恶,将自己的个人情感注入到历史叙事中不足为奇。即使人们不会期待历史学家绝对公正地叙述历史,抑或对历史学家的个人恩怨、情感表示宽容,都无法改变历史学家以“非在场”身份追述历史的事实。某种意义上讲,人们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种种判断,实际上是对历史学家“非在场”叙事——追述的评判。故此,西方学者有言:“‘历史学家’名号的价值在于,他们必须让自己的断定隶属于批评性审视。”^①

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”,^②柯林伍德的名言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深刻久远,更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思想与历史生成之间的关系。“柯林伍德坚持行动包含思想,这些思想可以被历史学家重新思考……。”^③一切历史之所以被称做思想史,无疑应归功于历史学家有思想含量的思考,是对历史事实审视、批判的结果。人们对柯氏名言有不同的理解或解读,但历史学家的思想一定是作为“局外人”,以“非在场”的身份获得的。从思想史意义上讲,历史学家的叙事不仅在追述历史,并在追述过程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,而且历史学家对历史上的思想也怀有浓厚的兴趣。^④通过历史学家的追述,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历史上的思想实现了有机的结合,使历史变成了思想史。历史承载着厚重的思想,厚重的思想也折射出“非在场”的历史学家追述的真实价值。

(作者张晓校,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;邮编:150080)

(责任编辑:景德祥)

(责任校对:王旭东)

① Marnie Hughes-Warrington, *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*, Second Edition, Routledge, 2007, p. 184.

② 柯林伍德:《历史的观念》,何兆武、张文杰译,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,第176页。

③ 汤因比等:《历史的话语: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》,张文杰编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271页。

④ 汤因比等:《历史的话语: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》,张文杰编,第288页。